

中国研究跟理论创新是什么关系? 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又是什么关系? 国别研究和一般贡献是什么关系? 现在政策研究越来越重视,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又是什么关系?

经济学创新中的几对关系

■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陈列

我以为今天这个会是让大家一起来讨论,怎么样更好地进行研究上的创新,而不是来讲自己做了什么创新。但我发现到目前为止,大家讲的都是自己的创新性研究,而我将从怎样更好地进行研究上的创新来谈。

我们这个会议叫做“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讨论创新研讨会”,所以,我想围绕为什么需要强调中国问题研究?怎样从中国问题研究产生理论创新来展开讨论。我觉得这里面有以下几对关系需要讲清楚,不然可能产生很多认识误区。中国研究跟理论创新是什么关系? 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又是什么关系? 国别研究和一般贡献是什么关系? 现在政策研究越来越重视,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又是什么关系? 如果时间允许,我也将介绍两项自己在研究方面尝试进行的一些创新工作。

先谈谈中国研究和理论创新是什么关系? 这个会议是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中国经济学”这个说法有时候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误以为是中国的经济学。我个人不主张这样理解,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没有中国的经济学,美国的经济学。经济学就是用科学的工具、方法,进行逻辑的推理,发现规律,解释现象。当然,我觉得中国经济学这个说法也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呢? 因为源于中国的素材,事实,可以开展很多创新性的经济学研究,我觉得这是最有价值的中国经济学研究。而我们这个会议所强调的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恰恰应该是基于中国的素材、中国的事实来提出创新的理论与洞见,或是对相关的理论进行检验,发现新的规律等等。

我个人从自己研究经历出发,认为我们只要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就会有很多东西值得研究,而且这里面是有大量的进行创新的空间的。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中国有其独特性,地理上的、制度上的、文化上的,这些独特性都是我们创新的源泉。以地理为例。中国是大国,而且地区之间异质性非常大,包括自然、发展阶段的都不一样。比如我们讲到环境治理问题,有人说环境治理国外可能花十几年时间就完成了,环境就彻底治理好了,但是,我觉得中国恐怕不一定,为什么? 因为当北京想搞环境治理,上海想搞环境治理的时候,内地还要GDP,内地对环境不是那么在意,而环境问题有严重的地区之间的负外部性。所以,我觉得在大国的背景下讨论环境治理会更为复杂,但这也恰恰是我们进行创新的源泉,这也是最近我与合作者在推进的研究工作之一,不久就能与大家分享这方面更多有意思的发现。我们的研究说明,恰恰是因为中国这个大国在地理与发展特征上和人家不一样,才可能使我们对于治理环境的问题有更深入的认识。

又比如说,新经济地理学有一个关于“中心—外围”的理论,但是实证上面一直没有很好检验,我们曾做过一个实证的工作来检验这个中心—外围模式。为什么中国会更适于检验这一理论呢? 因为独特的地理。第一,中国足够大,而中心—外围理论是需要有一个大的空间尺度来体现其机制的。第二,中国仅在东部有大港口,而出海口接近国际市场,这就是理论模型中的“中心”,内地则是“外围”。

以高质量的新制度供给促进改革创新型国家建设

《中国关键:提升经济国际竞争力》一书的研究方法和核心观点

■ 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 黄剑辉

►►►[上接 01 版]

(六)基于提升中国金融业国际竞争力战略研究的政策建议

第一,放开金融要素管制和改善货币政策操作。包括:推进利率市场化、推进汇率市场化、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完善外汇储备管理机制、改善货币政策操作。

第二,进一步加强金融市场建设。包括:一是在信贷市场方面,要加强改善小企业融资,引导金融机构积极服务农村金融市场;二是在资本市场方面,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取向,要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是发行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是还权于市场、还权于投资者的重大改革,也是资本市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这个改革会带动和促进很多方面的改革;四是市场化也必然要求国际化,只有资本市场实行双向开放,通过“引进来、走出去”,才能够进一步促进市场化;五是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六是在公司信用类债券市场方面,要形成真正的信用风险文化;七是国债期货是重要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应配合利率市场化,重启国债期货;八是发展资产证券化;九是发展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主要是CDS(信用违约掉期);十是互联网金融体系建设。



美国虽然也足够大,但是两面靠海,中心到外围的空间尺度可能就不够了。

中国的制度同样有其独特性,我们有大量的积极的干预政策,比如产业政策就被积极广泛地实施。但是产业政策的效果到底怎样?这在理论上一直是有争论的。中国的产业政策给我们一个检验产业政策是否有效的一个制度实验场。包括对于产业政策的效果取决于什么这样的问题,我们也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回答。

中国的文化同样独特。经济学研究里面有一个关于社会网络在市场化中的作用到底怎样的研究话题。例如,人际关系或关系网络是不是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就变得不重要了?其实不一定,很有可能是社会关系嵌入到市场机制里面,帮助个人攫取利益。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问题,所以我们曾考察过关系在个人是否进入高收入行业中起到什么作用。源自于中国丰富的素材,我们也能够对现有理论进行再检验,如果里发现现有理论不能解释中国现象,你就可以进一步思考为什么,这就是提出新理论的可能性,是创新的源泉。

我要说的第二对关系就是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我觉得有一种倾向,好象大家比较重视理论研究,不是那么强调实证研究。比如到目前为止大家的发言,基本上都是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确实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应该是基于对中国事实素材的认识来提出新的理论,这两个东西是缺一不可。就是说你要检验理论,要发现新规律,你不要有事实的观察,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你得知道,这是需要有实证研究告诉我们的。另外一个,当我们试图提出新理论的时候,首先得知道原有的理论是什么,这个参照系是什么?不能参照系都没有搞清楚,你就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样学科就没有进步了,没有传承了。即便我们不是看计量研究,只是看案例,我们也要遵循科学精神,把这个事实说清楚,而不是像记者或愤青一样,这个说说,那个扯扯,然后凭空抛出所谓的创新理论,这离我心目中认为的经济学的创新应该的模式相差很远了。

正是因为中国有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很

多政策又在不同时间点上推行,政策的力度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很多外生性的制度变化在时间、空间和程度上都有差异,这给了我们大量的机会去做一些准自然实验的经济学分析,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比如最近我们有一项研究想回答出口加工区的政策效果到底怎样,我们发现,如果所扶持的产业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那么这一出口鼓励政策就能显著促进出口,否则,其效果就不显著。这项实证研究本身也说明,有了这样一个关于比较优势的理论与实践指导,就可以帮助我们验证这样的理论。

另外我要讲的就是国别研究和一般贡献的关系。一般人认为好像中国研究就是做中国问题的研究,好象要低一个档次似的。其实跨国研究,国别研究都非常有必要,但是做国别研究,你不能只说我就是做这个国家的研究,你要通过这个国家的具体素材找出一个具有一般性的规律。我们需要把国和国进行比较,因为国和国的制度环境不一样,这样才能更好地检验现有的理论,因为现有的理论往往是在某一特定的制度环境下得出的。所以,科斯在《经济学中的灯塔》里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一般化可能并不是有益的”,就是认为理论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想法可能并不正确,“除非得出这种一般化的研究考察了在不同的制度框架内这些活动到底是怎么产生的”。结合中国的情况,因为中国的地理、文化、制度和别人不一样,把现有的理论拿过来的时候,特别需要在中国检验一下,看看这个规律在中国制度框架下是不是成立。从这个角度讲,针对任何一个国家的研究都可能会很有价值。比如日本学者的一项研究发现,西方企业内部成功实施的对外销售人员的计件激励方式在日本却没有改善员工的绩效。为什么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恰恰是这一理论并没有考虑企业内部的集体主义文化,而这在日本却极为重要。所以,在一个不同的文化下面可以产生很好的激励效果的政策,换一个环境可能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拓展原有的理论了,这个就是理论创新的一种途径。

我很想讲的最后一对关系就是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现在政策研究越来越被强调,各

个地方都在搞智库,我所在的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是上海市高校的智库。目前,大家对政策研究都是越来越为重视。但是,现在可能有这样一个错误的认识。比如,有时我们可能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年轻人就是要多发论文,评了教授那么压力了,就可以多做点政策研究。也有时,不同的学者被贴上不同的标签,你是做政策研究的,他是做学术研究的。我并不认可以上的这些说法,在我看来,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没有明显的界限。那么,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是什么关系?或者说,什么才是好的政策研究呢?在我看来,好的政策研究,就是“有明确政策指向的学术研究”。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其实是一回事。特别是对于广为建设的这个智库,这里所说的学术研究应该具有明确的政策指向,就是你所从事的研究项目要有明确的应用性,所提出的学术问题从实践中产生,其答案又对实践有很强的指导价值。当然,既然强调仍然是学术研究,就要有科学性,但科学性难道不也是政策研究应该坚持的原则吗?所以像茅老(茅于軾先生)讲的公租房不要设单独卫生间的说法,我在复旦上《信息经济学》课时就会拿来跟学生讨论。我问学生,很多人反对这个观点,你们怎么想?其实我想引导学生明白的道理就是,这个说法的背后是机制设计的理念:你只有把廉租房的质量向下扭曲以后,穷人才能够真正得到这个房子,这就是一个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次优选择。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这种看起来的不合理却是最优的。反过来,如果你把承租租房市场上上的房子差不多标准,那么真正的穷人恐怕就难以分享了。这就是对政策的科学性的考虑。当然,我觉得智库还应该有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独立性和前瞻性。所以,智库不应该只回答政府提出的问题,也不只是解决眼下政府碰到的困难。这样你才既可以有独立性,还可以有超前性。我们刚刚做了一项关于职业教育回报的研究,我之前并没有专门关注教育的回报,为什么突然开展这项工作呢?因为我发现,不论是中国目前所强调的产业升级,还是城市化过程中各种成本的不断提高,都会使得以前那种靠廉价劳动力而推动的制造业增长模式不能长期维持了,我们需要有人力资本的技能提升。但是,我们的农民工现在做不到这一点,怎么办?靠高等教育吗?异地高考的推进很难,大学生自己也面临就业难的问题,相反,职业教育的人才就业率却要高得多。但是,沿海地区在职业教育上也仍然存在一些与户籍相联系制度性壁垒。那么,职业教育是否急需打破户籍门槛的限制呢?这取决于农民工在不同地区接受职业教育后,其人力资本的回报有无显著差异。我们的研究发现,农民工在东部地区接受教育的质量高于在中西部地区,所以职业教育需要向农民工放开户籍限制,让他们在东部发达地区也能平等的接受职业教育。这也符合发达地区自身吸引高技能劳动力,加速产业升级的要求。我以这个研究为例,想说明的是,这是一项学术研究,但同时也能够为政策提供有价值的指引,这正是我所认为的学者以智库研究人同的身份应该做,也能够做好的事。

(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5月6—7日“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演讲修订稿,标题为编者所加)

外眼看中国

中国面对“建得太多”后遗症

在中国第六大城市天津的远郊,荒凉的盐碱地上矗立着几十座建了一半的摩天大厦。它们是中国房地产市场过度乐观和供应过剩的象征。如果要证明中国房地产存在泡沫,很少有哪个例子能比这轮在距北京150公里、距天津40公里的荒地上复制华尔街的努力为更具说服力。于家堡金融区是以曼哈顿为蓝本建设的,配有一群仿洛克菲勒中心的建筑和一座看起来有种奇怪的似曾相识感的双子塔。

官员们夸耀称,到2019年该项目完工时,至少就土地面积而言,它将比伦敦金融城大1/3,比纽约金融区大两倍多。但是,在中国各地经历多年建设狂潮、房价快速上涨后,中国房地产市场正显现出泡沫即将破裂的迹象。于家堡项目的命运现在要打一个问号。

中国房地产市场只有短短15年的历史,没有人经历过真正的崩盘。20世纪90年代末之前,后共产主义中国的大多数城市居民,还靠他们的工作单位来提供住房。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就有不少人警告中国存在房地产泡沫,这促使政府出台了限购措施和首付限制,来减缓房价上涨。但当金融危机真正到来、经济直线下滑后,中国政府决定用一波信贷潮再度吹起这个泡沫。结果是债务的迅速反弹。2008年末,中国总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约为140%,到今年6月末时,这个比例已升至250%以上。

要弄明白危机引发的这波建设狂潮的规模,可参见以下统计数字:仅2011年和2012年这两年,中国的水泥产量就比美国在整个20世纪的水泥产量还多。在过去10年里,这波热潮一大半是由购房刚需驱动的。有这种需求的人包括想作城市人或想改善住房的人,以及刚致富不久、但很难找到其他投资渠道而投机房地产的人。

中国股市自2007年巨大的泡沫破裂以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银行存款的回报微不足道甚至为负;而资本管制使得中国居民不能轻易地投资海外、让自己的资产组合更加多元化。中国政府自身也有强大的动机不断吹大这个泡沫。中国的全部土地实际上都属国有。根据摩根大通的估算,去年卖地收入占地方政府预算收入的60%。

2008年以来,土地价格上涨了4倍,引发相应的资产价格上涨。然而尽管价格飞涨,供给急剧增加,对住房和写字楼的需求也在同步增长——直到今年,局面发生了变化。今年6月,70个大中城市中有55个城市的房价环比下降,而5月环比下降的仅有35个。始于今年初的房价下行趋势有所加强,这也是2008年12月以来价格环比下降最猛的一个月。

“中国房地产市场似乎到了一个拐点。”摩根大通经济学家朱海濱在最近一份报告中称。“住房市场放缓是中国近期主要的宏观风险。”拐点似乎已经到来,因为中国实在建得太多了。截至2011年,绝大部分市场都处于供应短缺状态,但现在在建总建筑面积已远远超过了4年的需求。在一些情况最严重的省份,供应量可满足超过7年的需求。

国家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表示,逾90%的中国家庭拥有至少一套住房,城市有房家庭近76%的资产为房产。他估计,要实现让每个家庭都拥有住房的目标,靠现有住房存量已绰绰有余,而开发商每年还在供应远超过1500万套的新房。

在于家堡,摩天大厦的建设速度变得极为缓慢,雄心勃勃的政府规划者思考着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泡沫终于破裂,而他们在天津的盐碱地上复制华尔街的梦想终将落空。

(FT中文网)



业,尤其是国有保险公司。引导保险业更好地服务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

第四,加强金融风险安全体系建设。包括:一是完善金融监管方式。明确政府与居民在金融活动中的责任,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实行功能监管,完善监管协调机制。划分监管边界,成就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转变监管理念,加强监管的独立性,监管当局应回归“裁判员”角色,让市场来配置资源,不能只注重机构监管和风险监控,要加强行为监管,且强化信息披露,发挥市场约束的作用。在当前分业监管的基础上促进监管协调。加强对“大到不能倒”金融机构的监管。对于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按外部责任大小,划分中央与地方金融事权和风险处置责任。二是建立存款保险机制。加快建立功能完善、权责统一、运作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促进形成市场化的金融风险防范和处置机制。三是完善金融机构、企业市场化退出机制。

(七)支撑中国开放创新体系的政策建议
主要包括:1.促进外资在开放创新体系中效应最大化;2.树立开放创新视野,大力推动国际技术转移合作;3.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全方位促进研发外包产业发展;4.加紧制定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完善市场化体系秩序;5.开放创新有赖于政府支撑和政府采购“双向开放”;6.努力构建有益于开放式创新的生态系统。

(完)